

望岳文库 · 文学史系列

先秦两汉文学的多维研究

廖群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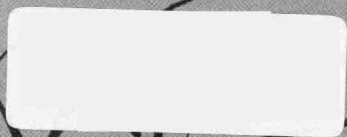


山东大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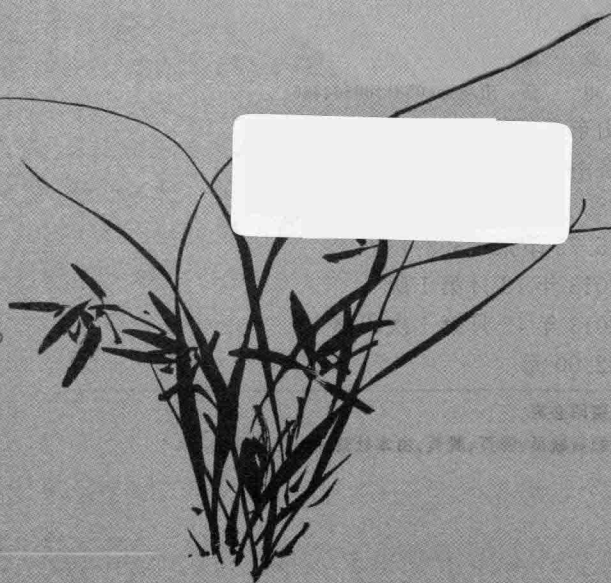
望岳文库
• 文学史系列

先秦两汉文学的多维研究

廖群 著




山东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先秦两汉文学的多维研究/廖群著.

—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3.12

(望岳文库)

ISBN 978-7-5607-4973-0



Ⅲ. ①中国文学—古典文学研究—先秦时代 ②中国文学—
古典文学研究—汉代
Ⅳ. ①I 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02415 号

责任编辑:董付兰

美术编辑:牛钧

出版发行:山东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山东省济南市山大南路 20 号

邮 编 250100

电 话 市场部(0531)88364466

经 销:山东省新华书店

印 刷:济南景升印业有限公司印刷

规 格: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15.75 印张 393 千字

版 次: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2.00 元

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凡购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本社营销部负责调换

目 录

引 言	1
第一章 文献考据学与先秦两汉文学研究	4
第一节 乾嘉学派与文献考据学	5
一、训诂与文献考据	6
二、顾炎武：开先河者	9
三、乾嘉学派及其文献考据	12
第二节 文献考据学与先秦两汉文学文本阅读	19
一、质疑、新解：先秦两汉文本考据的缘起和思路	20
二、文本考据方法与门径	24
三、文献证据	28
第三节 文献考据与先秦两汉文学问题研究	30
一、清代学者对《古文尚书》的辨伪成果	30
二、高亨关于老子生平一段经历的考证	34
三、陆侃如、古直关于《孔雀东南飞》成诗年代考证之争	37
四、“说”、“传”、“语”：先秦“说体”考索	42

第二章 考古学与先秦两汉文学研究	56
第一节 王国维的“新发见”与“文学考古”的兴起	57
第二节 “文学考古”与文献考据的互补性	62
一、文学考古:对文献考据研究的重要补充	62
二、文学考古必须与文献考据等其他方法相结合	77
第三节 出土文物与先秦两汉文学研究	79
一、考古与“嫦娥奔月”新证	80
二、考古释“鱼”:文学考古与《诗经》礼俗诗研究之一	88
三、楚简本《老子》的出土与老子、庄子关系的重新审视	100
四、考古与屈原创作的认定	113
五、《先令券书》与《孔雀东南飞》悲剧释疑	128
第三章 文化人类学与先秦两汉文学研究	141
第一节 用文化人类学方法解决疑难:从关于大舜的一个 “案例”说起	141
第二节 文化人类学的源起及其流派	146
一、关于“文化人类学”的界定	146
二、西方文化人类学的产生、发展及主要学派	149
三、文化人类学名著《金枝》	173
第三节 文化人类学与先秦两汉文学研究	199
一、文化人类学与先秦两汉文学研究的历史回顾	200
二、新时期以来先秦两汉文学的人类学研究举隅	216
第四章 传播学与先秦两汉文学研究	252
第一节 关于文学传播	253
一、传播	253
二、传播学	254

三、文学传播	257
第二节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的传播学视角	258
一、西方传播学的传入与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研究的兴起	258
二、中国古代文学的传播研究	260
第三节 传播学与先秦两汉文学研究	265
一、筮人“掌三易”及《周易》在先秦的传播	266
二、“对话式”与“自述式”：《诗经》初始传播方式考索	282
三、从“行吟泽畔”到“世传楚辞”：屈辞初始传播考索	292
四、厅堂说唱与汉乐府艺术特质探析	311
第五章 阐释学、接受理论与先秦两汉文学研究	325
第一节 从阐释学到接受美学	325
一、阐释	325
二、现代西方阐释学	326
三、接受美学	334
第二节 中国古代文学“接受”研究的兴起及其理论探讨	344
一、接受美学的传入与中国古代文学接受研究的兴起	344
二、中国古代文学接受研究的理论探讨	346
第三节 先秦两汉文学的接受研究	349
一、代言、自言与刺诗、淫诗：关于《国风》的两种阐释	349
二、《风》诗古今接受异同说	363
三、从《庄子》外杂篇看庄子后学对庄子的接受	376
四、楚辞接受研究综览	404
五、从诗歌创作看李白对《史记》人物的接受	417
第六章 叙事学与先秦两汉文学研究	421
第一节 法国叙事学	421
一、叙述及叙述学	423

二、叙事学基本问题研究	424
第二节 叙事学在中国	438
一、叙事学视角的传入及反应	438
二、中国古代文学的叙事研究	445
三、叙事学与先秦两汉史传文学研究	449
第三节 《左传》叙事学研究补述	470
一、《左传》的作者与叙述者	471
二、《左传》叙事视角增论	478
三、《左传》时序中的“预叙”辨析	487
后 记	493

引言

原始人不明白天和地何以相距遥远又不离不弃，于是想象着天有八柱支撑，地有四绳拴角，这拴住大地四角的粗绳就叫作“维”。《楚辞·天问》还曾就此发问，所谓“斡维焉系？天极焉加？”由此生发。东南、西南、东北、西北四隅被称为“四维”，《淮南子·天文训》就有“日冬至，日出东南维，入西南维……夏至，出东北维，入西北维”的说法。这大概就是“维”怎么会成为角度、方向的缘故了。后来所谓“三维空间”等等，也应由此而来。当下学术研究中所讲的“多维”，就不只是三维、四维，而是多个视角，是多种学理、方法和视域。

综观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历程，确乎呈现了不断向多维扩散的趋向。近现代之前的整个古代时期，传统的文学研究处于经学的统摄下，以对具体篇目、章句的注疏考据为主；超出经学范围的诗词文赋研究，则以对具体作品的注释、感悟和评点为主，兼及文风的传承和流变。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甲骨文等一批出土文物的重大发现，王国维率先倡导用地下发掘的材料证明纸上的材料，这一“二重证据法”的提出，带来了借助考古以研究古代文学

的新视角。几乎与此同时,西方各种理论陆续传入中国,前辈学者开始尝试从不同角度、借助多种跨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以研究古代文学问题。除文献考据方法和考古学方法之外,诸如文艺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都属于新的领域。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就有汲取西方文艺学范畴把握中国古代诗词的部分,梁启超《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一文中提到“浪漫的表情法”和“写实的表情法”,无疑也是西方文艺学概念。他在1922年出版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对姜嫄“履帝武敏”而生后稷和简狄吞燕卵而生殷祖契的传说,以母系氏族社会不知有父作解,成为我国借助文化人类学研究古代文学的先驱。随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用民俗学、文化人类学研究神话、《诗经》、楚辞等蔚成风气。三四十年代,郭沫若的《屈原研究》则分明带有社会学的倾向。后来,由于历史的原因,社会学的视角越来越为学界所接受,直至新中国成立后,这一趋向占据了学术研究的主导地位,甚至一度出现了庸俗社会学垄断学术的格局。进入新时期以来,学术思想空前解放,单一的研究模式被打破,古代文学研究也呈现出多元化的格局,上述曾经出现过的视角重新恢复,除文献考据仍作为研究基础之外,文化人类学视角为古代文学研究发现了许多新的课题,借助出土文物更为研究带来了新的生机。20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一些新兴理论的传入也在古代文学研究领域迅速出现反响,阐释学、接受美学、传播学、叙事学等等,都为古代文学研究带来了新的视角和方法。

视角和方法是学术研究获得成果的必经之路;运用多维视角和方法,自然可以获得更加丰硕的成果。其前提是要走对路数而不要误入歧途。因此,对各种视角和方法的理论把握、对以往多维研究实践的展示和总结,是本书的宗旨所在。这里主要涉及的是借助各种理论和方法以研究古代文学的问题,其中既包括我国传统的治学方法,也包括来自西方的学术理论。但这不是一部纯理论或方法论著作,而是属于史论结合型的研究著作。其中有对不

同视角、方法、理论的阐述和辨析,包括这一理论的源起、基本学说、代表人物及其著述,还包括古代文学研究者对这一理论的吸收和把握;其中更有对学者们借助这一理论、视角和方法研究、解决古代文学问题的典型个案的介绍和分析;其中还有笔者本人的尝试。

中国古代文学源远流长,我们这里拟将文学研究对象相对集中限定在先秦两汉文学范畴中。一方面是因为先秦两汉文学的特殊性决定了它们更需要借助多种方法进行考察、挖掘和把握,另一方面也是笔者本人长期以来的研究方向所规定的。从已有先秦两汉文学研究的实际出发,本书拟将考察具体分为文献考据学与先秦两汉文学研究,考古学与先秦两汉文学研究,文化人类学与先秦两汉文学研究,传播学与先秦两汉文学研究,阐释学、接受理论与先秦两汉文学研究,叙事学与先秦两汉文学研究六个部分。

如果通过本书的介绍,读者能对古代文学研究中呈现的多维视野有所感受,对学者们所借助的各种理论、视角和方法有了更加明晰的认识,对借助多种视角方法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有了更多了解,特别是能够打开思路,在这些新的视角中或借助这些方法,进一步展开新的研究,那么本书也就完成了它的使命。

第一章 文献考据学与先秦两汉文学研究

两千多年前，孔子弟子子夏赴晋经过卫国，听人在读史书，称“晋师三豕涉河”，子夏判断“非也”，“三豕”应该是“己亥”之讹，问题出在字形上，“夫己与三相近，豕与亥相似”。待他到了晋国一问，果然是“晋师己亥涉河也”（《吕氏春秋·慎行论·察传》）。

九百多年前，宋代名相王安石作《诗经》新注时，遇到《豳风·七月》“八月剥枣，十月获稻”一句，不知是因为他没有注意到《毛传》已经称“剥，击也”，还是因为他认为解“剥”为“击”不可思议，总之他将“剥”字直接按字面意思解作了“剥离”之“剥”，称“剥者，剥其皮而进之，所以养老也”。其实，“剥”是“支(pū)”的借字，即敲击，“剥(pū)枣”即打枣。后来他“从蒋山郊步至民家，问其翁安在，曰：‘去扑枣。’始悟前非，即具奏，乞除去十三字”。（典出洪适《容斋续笔·注书难》）

《诗经·静女》中有“爱而不见，搔首踟蹰”句，《毛传》称“言志往而行正”，《郑笺》进而申说云：“志往谓踟蹰，行正谓爱之而不往见。”既然“爱之而不往见”，何来下文“贻我彤管”、“自牧归荑”？清代学者马瑞辰在《毛诗传笺通释》中指出：“爱者，蔓及偃之省借。

《尔雅·释言》:‘蔓,隐也。’”^①原来,姑娘是故意躲起来逗小伙着急。

“三豕过河”的故事涉及解决字形讹误与揭示文本记载事实真相的问题,军队中三头猪过河与军队于己亥日过河,毕竟相去甚远。“八月剥枣”的歧注涉及解决声音通假与贴近生活本色的问题,把打枣解成给老人剥枣皮,孝则孝矣,可惜属于无中生有。“爱而不见”的新解涉及识别省借与理解诗篇的问题,《静女》的“爱”字变成“蔓”,其诗意、情景顿时变得活泼生动起来。由此不难发现,有时解决一个字、一个词,对于解读文本,进而深化研究是何等重要。

通过辨识文字、审订音读、明晰假借、校勘古籍等文献考察以解决文本篇章句读和揭示文本真相,或者,更准确地说,通过运用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以及通过文献考察和典章制度的考究以研究古代典籍,这就是文献考据之学。这种学问本缘于明经,又波及研史,但同时也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的基本方法之一,“八月剥枣”、“爱而不见”两条即是关于《诗经》的解读。它既属于经学研究的范畴,同时也是在解决文学作品的理解和阅读,进而还涉及对其表现手法和艺术风貌的把握。借助文献考据的方法研究古代文学,也就是王国维先生所说的用“纸上之材料”来研究问题的学问,这属于传统治学方法,沿袭了几千年,而且至今仍是基本方法之一,值得首先予以阐释和总结。

第一节 乾嘉学派与文献考据学

文献考据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与清代乾嘉学派密切相关。

^① 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57页。

了解乾嘉学派,是进入文献考据学的直接路径。

一、训诂与文献考据

文献考据并不始于乾嘉学派。自古典文献开始传播之日起,对于文本的解释、训诂、考据就已经应需而生、相伴而在了。

《国语·周语下》即记载有晋国叔向在与单靖公之室老谈话中对《周颂·昊天有成命》一诗的解释:

《昊天有成命》,《颂》之盛德也。其诗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缉熙!亶厥心肆其靖之。”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能定武烈者也。夫道成命者,而称昊天,翼其上也。二后受之,让于德也。成王不敢康,敬百姓也。夙夜,恭也;基,始也。命,信也。宥,宽也。密,宁也。缉,明也。熙,广也。亶,厚也。肆,固也。靖,稣也。其始也,翼上德让,而敬百姓。其中也,恭俭信宽,帅归于宁。其终也,广厚其心,以固稣之。始于德让,中于信宽,终于固和,故曰成。

其中,“基,始也。命,信也。宥,宽也。密,宁也。缉,明也。熙,广也。亶,厚也。肆,固也。靖,稣也”,就是在进行以今言释古言的训诂,所谓“诂,古也;古今异言,解之使人知也”(《尔雅·释诂》邢昺疏)。

汉代传授《诗经》著名的四家,也各有注释解说。据《汉书·艺文志》,当时有《鲁故》二十五卷,《鲁说》二十八卷,《齐后氏故》二十卷,《齐孙氏故》二十七卷,《齐后氏传》三十九卷,《齐孙氏传》二十八卷,《齐杂记》十八卷,《韩故》三十六卷,《韩内传》四卷,《韩外传》六卷,《韩说》四十一卷,《毛诗故训传》三十卷。惜三家诗不传。毛诗有《毛诗故训传》及后来的《毛诗传笺》(东汉郑玄)、《毛诗注疏》(唐孔颖达),合本称《毛诗正义》,其中就涉及许多声训、形训等文本考据问题。

比如《周南·关雎》“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毛传》：“逑，匹也。言后妃有关雎之德，是幽闲贞专之善女，宜为君子之好匹。”这里应是读“逑”为“雎”，然后解“雎”为匹。《尔雅·释诂上》：“雎，匹也。”《周南·兔置》“赳赳武夫，公侯好仇”，《孔疏》：“毛以为赳赳然有威武之夫，有文有武，能匹耦于公侯之志，为公侯之好匹。此虽无传，以毛‘仇’皆为匹。”由此可佐证《毛传》“逑”确读为“仇（雎）”。实是用了声训，音同、音近相通。

再比如《周南·汉广》“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毛传》：“方，泝也。”郑《笺》云：“汉也江也，其欲渡之者必有潜行乘泝之道。”是读“方”为“泝”，即“桴”。《尔雅·释水》：“庶人乘泝。”郭璞注：“并木以渡。”此也是用了声训，音近相通。

经学之外，史学、子学也各有解注。兹以《史记》研究为例。《史记》研读历六朝至唐，著名的注本有刘宋裴骃的《集解》，唐司马贞的《索隐》和唐张守节的《正义》，合刊人称“《史记》三臣注本”，更是多方面涉及文字校勘、正讹、训释、事实考订等文献考据问题。

解决文字训诂考订问题，比如《五帝本纪》“黄帝者……幼而徇齐”，《集解》云“徇，疾；齐，速也。言圣德幼而疾速也”。《索隐》认为“徇，齐，皆德也”。并广引文献为证：“《书》曰‘聪明齐圣’，《左传》曰‘子虽齐圣’，谓圣德齐肃也。又案：《孔子家语》及《大戴礼》并作‘叡齐’，一本作‘慧齐’。叡，慧，皆智也。太史公采《大戴礼》而为此纪，今彼文无作‘徇’者。《史记》旧本亦有作‘濬齐’。盖古字假借‘徇’为‘濬’，濬，深也，义亦并通。”接着，《索隐》还进一步考究“徇”“濬”二字的的关系：“《尔雅》‘齐’‘速’并训为疾。《尚书大传》曰‘多闻而齐给’，郑注云‘齐，疾也’。今裴氏注云徇亦训疾，未见所出。或当读‘徇’为‘迅’，迅于《尔雅》与齐俱训疾，则迅濬虽异字，而音同也。又《尔雅》曰‘宣，徇，遍也。濬，通也’。是‘遍’之与‘通’义亦相近。”这里辗转引证，解决了“徇”、“濬”相通的问题。

再比如《殷本纪》有“遂伐桀。汤曰：‘……予其大理女。女毋

不信，朕不食言””的记述，对于“大理女”，《集解》云：“《尚书》‘理’字作‘賚’。郑玄曰：‘賚，赐也。’”则“大理女”即隆重赏赐之义。《周本纪》有“周公受禾东土，鲁天子之命”的记述，对于“鲁”字，《集解》引徐广曰：“《尚书序》云‘旅天子之命’。”则“鲁”当借作“旅”。《殷本纪》有“有飞雉登鼎耳而响”的记述，对于“响”字，《正义》云：“音构。响，雉鸣也。《诗经》云：‘雉之朝响。’”（按，今本《小雅·小弁》：“雉之朝雊，尚求其雌。”）则“响”乃雉鸣之义。这些注释或是引书以正讹误，或是引诗以正音义，由此解决了文字的正读、正解。

解决名物和历史事实问题，如《殷本纪》“汤归至于泰卷陶”，关于“泰卷陶”，《集解》引徐广曰：“一无此‘陶’字。”引孔安国曰：“地名。”《索隐》云：“邹诞生‘卷’作‘垆’，又作‘洞’，则‘卷’当为‘垆’，与《尚书》同，非衍字也。其下‘陶’字是衍耳。何以知然？解《尚书》者以大垆今定陶是也，旧本或傍记其地名，后人转写遂衍斯字也。”由此知商汤所归之地为泰垆，即定陶是也。

再比如《周本纪》“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关于“共和”，《索隐》首先云“共音如字”，知其解“共”为“共同”之义。接着又云“若《汲冢纪年》则云‘共伯和干王位’。共音恭。共，国；伯，爵；和，其名；干，篡也。言共伯摄王政，故云‘干王位’也”。《正义》首先引韦昭云：“彘之乱，公卿相与和而修政事，号曰共和也。”又引《鲁连子》云：“卫州共城县本周共伯之国也，共伯名和，好行仁义，诸侯贤之。周厉王无道，国人作难，王奔于彘，诸侯奉和以行天子事，号曰‘共和’元年。十四年，厉王死于彘，共伯使诸侯奉王子靖为宣王，而共伯复归国于卫也。”也摆出两说。接着引《世家》云：“釐侯十三年，周厉王出奔于彘，共和行政焉。二十八年，周宣王立。四十二年，釐侯卒，太子共伯馀立为君。共伯弟和袭共伯于墓上，共伯入釐侯羡自杀，卫人因葬釐侯旁，谥曰共伯，而立和为卫侯，是为武公。”然后《正义》加按语云：“按此文，共伯不得立，而立和为武公。武公之立立在共伯卒后，年岁又不相当，年表亦同，明《纪

年》及《鲁连子》非也。”《正义》所引《世家》为《史记·卫康叔世家》，以《史记》证《史记》，知《周本纪》这里的“共和”肯定不是共伯和。

然而，无论是四家注《诗经》，还是三臣注《史记》，校勘、正讹、训诂、考订都是在文本注释的实践中自发进行的，并没有对这些方法上升到理论加以总结，也没有形成专门的研究著作，更没有出现以求古求真的实证考据相标榜的考据学派。

文献考据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应该说始于清代乾嘉学派。乾嘉学派是经学史上的一个学派，在治经中主张通过明古字古音以明古训，明古训然后明经，首重音韵、文字、训诂之学，进而扩展到对史籍、诸子的校勘、辑佚、辨伪，留意于对金石、地理、历法、天文、数学、典章制度的考究，被称为“考据学派”。这里所谓“文献考据之学”，就是综合运用上述各种学科门类以解决典籍中的问题的治学方法。

二、顾炎武：开先河者

其实，所谓“乾嘉学派”，只是后人对于清代乾隆、嘉庆时期盛极一时的考据之风及其著家、著述的笼统称谓。追本溯源，明末清初的顾炎武一般被认为是首开先河者。

顾炎武(1613~1682)，学者尊为亭林先生，江苏昆山人。明清之际著名的思想家、史学家、语言学家，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信念，积极参加抗清复明斗争，同时以“经世致用”的旨趣，致力于学术研究，终生不仕清廷。清初当他陷于危难之时，挚友归庄为觅援手，无奈代他拜当时的文坛领袖钱谦益为师，他得知后欲索回门生贴子而不得，于是于通衢大道四处张贴告白，以明自己从未列于钱氏门墙，其气性可见一斑。尽管事业屡屡受挫，却始终保持“大海无平期，我心无绝时”(《精卫》)的精神；直至晚年，仍以“苍龙日暮还行雨，老树春深还著花”(《又酬傅处士原韵》)的“壮心”坚守自己的人生选择和节操。

顾炎武一生读书研思所得,大多集中于《日知录》三十二卷中。该书篇目前自记曰“自少读书,有所得,辄记之。其有不合,时复改定,或古人先我而有者,则遂削之。积三十余年,乃成一编”。这部巨著以札记形式考镜源流,释疑解惑,“大抵前七卷皆论经义,八卷至十二卷皆论政事,十三卷论世风,十四卷、十五卷论礼制,十六卷、十七卷皆论科举,十八卷至二十一卷皆论艺文,二十二卷至二十四卷杂论名义,二十五卷论古事真妄,二十六卷论史法,二十七卷论注书,二十八卷论杂事,二十九卷论兵及外国事,三十卷论天象术数,三十一卷论地理,三十二卷为杂考证”(《四库全书总目》),所涉极为广博,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乃是“平生之志与业皆在其中”^①。

关于顾炎武在这部书中体现的治学特点,潘耒在《日知录序》中称:“凡经义史学、官方吏治、财赋典礼、輿地艺文之属,一一疏通其源流,考正其谬误。”“有一疑义,反复参考,必归于至当;援古证今,必畅其说而后止。”^②

就文献考据而言,其中有的是广征博引文献资料以证古代风尚。如他发现“古人之坐,以东向为尊”,为了证明这一点,他一列举了《新序》、《史记》、《汉书》、《后汉书》、《礼记》、《旧唐书》等书中的有关记述近二十条。诸如《新序》:“楚昭奚恤为东面之坛一,秦使者至,昭奚恤曰:‘君客也,请就上位。’”《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言:“括东向而朝军吏。”《汉书·盖宽饶传》言:“许伯请之,乃往,从西阶上,东乡特坐。”《后汉书·邓禹传》言:“显宗即位,以禹先帝无功,拜为太傅,进见东向。”《曲礼》:“主人就东阶,客就西阶。”自西阶而升,故“东乡”,自东阶而升,故“西乡”。《旧唐书》:卢简求子汝弼为河东节度副使,“府有龙泉亭,简求节制时,手书诗一

① (清)顾炎武:《与友人论门人书》,《亭林诗文集·亭林文集》卷之三(《四部丛刊》本)。

② (清)潘耒:《日知录序》,顾炎武:《日知录》卷一(《四库全书》本)。